

由《孫子兵法》談國家安全戰略思維

嘉南藥理大學教授

余元傑

資料來源：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清流雙月刊 108 年 9 月號¹

《摘要》

被稱作是「智庫中的智庫」的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指出，正當華府準備用傳統戰爭方式來應付世界其他強權的崛起時，中國大陸則將目標轉向實踐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前言

「不戰而屈人之兵」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均出自《孫子兵法》的「謀攻篇」，顯見我們實有必要重新審視孫子「謀攻思想」，綢繆並制訂務實有效的國家安全策略，方能更周延因應北京對臺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導向的統戰威脅。

謀攻與國家安全策略

研究軍事戰略的人都知道，對付敵人絕非一次接著一次的賽局，伐謀不行，那就不用伐交，伐交失利，再使出伐兵手段，此並非務實做法。真正的戰略，是伐謀、伐交與伐兵並舉，只是在優先性與比例上有所不同罷了。

伐謀與國家安全策略

對孫子而言，最高明的方式，就是幫對方解決問題，一方面能增加自己利益或解決衝突；另一方面也能讓敵對方不致於使用極端方式來解決衝突。一般人都認為孫子「上兵伐謀」的目標要不是太難，就是陳義過高，只能當作理想。然事實上，在國際關係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即主張，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各國之間互相依存的程度更甚以

¹ 余元傑，2019，〈由《孫子兵法》談國家安全戰略思維〉，《法務部清流雙月刊》，(23)：15-19。

往，和平、戰爭、經濟貿易與其他攸關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問題，都需要互相合作與支援方能克竟其功。同時，隨著氣候變遷、海盜、恐怖主義氾濫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盛，任何單一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沒有能力憑一己之力克服上述嚴峻挑戰，必須進行跨國性（無論是友好國家與敵對國家）的合作與協調，這就給予敵對雙方一個透過溝通、協調與合作的機會，能降低敵意與引爆戰爭的風險，達到雙贏或多贏的目標。

對此，我國應本「自由主義」精神與包括大陸在內的國家廣結善緣，擴張「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兩岸與國際合作範疇，再逐漸擴散至雙方都需要的和平安全環境，增加善意的同時，方能化解不必要的敵意與衝突，進而以和平手段解決兩岸政治歧見。

伐交與國家安全策略

西元前 508 年，孫武向吳王闔閭獻「伐交辟楚」之計，簡單來說，就是交好楚國周邊臣屬國，離間他們與楚國之間的關係；一方面能疲楚、孤楚，另一方面也為吳、楚兩國提供緩衝，使吳國得以休養生息。漢高祖被單于圍困白登，情勢一度危急，遂採用陳平之計，派遣使臣賄賂單于之妻閼氏，才得以倖免；而後文、景帝施行和親，才換來二十多年和平。而美國於甘迺迪總統任期內發生古巴危機，他一面圍困古巴做足準備，另一面也不放棄熱線溝通，最終美、蘇放棄部署飛彈化解危機。上述案例均顯示「伐交」在國家安全上的重要性。

孫子的「伐交」，除了透過盟邦來孤立敵方，使敵方屈服於己方聯盟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化敵為友。值得一提的是，根據 1991 中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毛澤東曾明確對黨指出：「統一戰線是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目前，為了達成「和平統一」的政治目標，北京比過去更加重視「統戰」的作用。在現代中國，統戰也許能夠被理解為高級「公關」；在臺灣，「統戰」則是讓人心生反感而須高度戒備的貶義詞；但其實，統戰可以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

帛，因此是門政治藝術；可以理解為儘可能團結朋友，甚至團結次要敵人，以打擊主要敵人。對此，我國務實之因應方式係可提供遭到中共統戰的案例教訓，並建構情報分享機制予國際友人，藉以反制北京透過「統戰」伐交，同時也能擴增我反統戰的國際外交力量。

伐兵與國家安全策略

孫子學專家許競任在《孫子探微》書中主張，孫子所謂「伐兵」，在現代國家安全策略上有兩層涵義，一是「嚇阻」，另一則是「擊虛」。

一、嚇阻性伐兵：

如果不能讓敵方放棄戰爭，至少要讓對方體認到用戰爭來解決問題反而會得不償失，因此而放棄以戰爭為手段的念頭；這樣的策略在動物界很常見。例如招潮蟹的巨螯是武器，但大多數時候則作為一種威嚇性警示標誌。此外，山羊的角是有蹄類動物中最長的，但他們幾乎不打架。人類社會當然也不例外，在春秋時代的墨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為了勸說處於強權的國君不要攻打弱小的宋國，因而除了多方道德辯論外，他還與魯班進行古今中外歷史上第一場兵棋推演，讓強權領袖體認到，攻打宋國完全是一個只賠不贏的賭局，之後強權國君就自行黯然打消念頭了！在兩岸關係方面，加拿大學者寇謐將(J. Michael Cole)在《島嶼無戰事：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書中指出中共正採取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戰略，透過宣傳來膨脹共軍的實力，讓那些區域小國不敢挑戰它，也嚇阻臺灣走向法理臺獨。另一方面，寇謐將認為我國也能對大陸進行有效嚇阻：臺灣的嚇阻力量取決於國軍對於入侵部隊迎頭痛擊的能力、我方經濟利益、國際聲譽，以及社會穩定性，還有在必要的時候，盟國會不會出兵協防臺灣的可能性。另外，從網路攻擊到破壞中共各地的通訊和銀行業務，到發動宣傳活動，扭轉全球輿論來反對北京等，都是我方能增加嚇阻力量的方式。最後，成功嚇阻力量的關鍵就是讓敵人相信，發動侵略將會付出

過高的代價，包括人命、物資和金錢的損失，以及對發動國國際聲譽的傷害。換句話說，對臺灣而言，勝利就是避免發生戰爭，讓北京明確知道，不可能用很快速和很低的代價就能打贏大戰。

二、擊虛性伐兵：

如何以最小代價，避實擊虛地折服敵方，是孫子「謀攻篇」的核心思想。在戰爭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運用創意以最輕便武器顛覆大型武器的案例。早在公元前 5 世紀，火船就曾造成海軍艦隊的恐慌與混亂，當時居住在今天義大利西西里島沿岸的敘拉古人(Syracusans) 找來一艘老商船，裝上樹脂和松木，然後放火燒船，任其漂向兵力較強的雅典人軍隊而獲勝。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朱元璋與陳友諒的「鄱陽湖之戰」，以及王陽明反制朱宸濠的「寧王之亂」，莫不採取類似的策略。2002 年美國神盾級驅逐艦在葉門外海遭到小艇炸彈攻擊而重傷，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三、科技降低核生化武器門檻的問題：

一般而言，核生化武器被視為嚇阻性大規模破壞武器，但隨著科技發達與普及，致使這些原來被用在「嚇阻」的武器，越來越有可能用於「擊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大陸的「731 部隊」就是從事生化武器研發的恐怖單位。此類比核武更為便宜的生化武器，日軍在二戰期間的研究大有進展，往後幾十年，美、蘇雙方都積極研發將致命病原轉變成武器的生化技術。更讓情勢複雜的是，發展生化武器並不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而且近年來價格更是不斷下滑。今日，要做出全世界最危險疾病的病原體，如 1918 年造成大約一億人死亡的禽流感病株，只要一間簡單的地下實驗室，花費幾千美元就可以完成。在 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Biological and Toxic Weapons Convention) 禁止生化武器研究前，美國每年花費 3 億美元在發展各種針對

人類、家畜和農作物的病原體，甚至展開以昆蟲散播病原體控制目標物的試驗；即使在頒布禁令後，蘇聯解體前仍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包括炭疽菌、瘟疫病毒、免熱病毒、肉毒桿菌、天花和馬爾堡病毒等。歷史告訴我們，為了贏得戰爭，人類不斷研發生化武器，當毀滅別人後，也會毀了自己。

結語

目前，面對兩岸軍力傾斜日益懸殊，國防部主張必須捨棄傳統思維，針對「戰勝」標準重新定義，不再談在戰場上殲滅敵軍，但務必要使敵人奪臺任務失敗；且為落實國軍「濱海決勝、灘岸殲敵」整體防衛構想，國防部已列出 10 項能強化「不對稱戰力」的武器清單，以反制共軍的入侵。這，無疑是正確的「伐兵」之道。

畢竟，現代國家安全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孫子所處的年代，除了軍事傳統安全範疇之外，也涵蓋經濟、氣候變遷、跨國性犯罪、恐怖主義與人道救援等非傳統性安全挑戰。面對日益嚴峻的兩岸關係，與非傳統安全的挑戰，有賴我國認清自身在國際角色所能發揮的功能，結合國際所重視與支持的民主政治和人權價值，形成價值安全共同體，同時也能客觀對比敵我「嚇阻」與「擊虛」能力，進而擬定反制對方、發揚我方科技在物理性作戰與法律、輿論、心理、金融與網路作戰方面的穿透性能量，方能嚇阻入侵戰爭的爆發，以有效確保國家安全。